

（上接3版）

采访组：您负责的工作除了“一室”，还有“三办”。对上海当时宏观上的规划部署，您一定了解很多“背后的故事”。请您谈谈当时习近平同志对哪些工作比较关注，提出了哪些要求和举措？

王战：那我就“三办”的职能分别谈谈。

第一个“办”：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年7月，上海市委参照浙江省委财经领导小组运作情况，成立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强化在市委领导下分析研究、协调本市财政改革发展指导方针、重大决策及有关重大财经问题。办公室设在市委研究室，由我任主任，市发改委主任兼副主任，主要负责筹备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整理形成会议纪要。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市委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效率和影响力都前所未有地得以提升。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难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其实早在浙江、早在上海，他就是这样考虑和部署的。

第二个“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主要是根据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关注的焦点问题，统筹相关部门成立课题组，协调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决策部署的落实。应该说，决策咨询委不仅服务于市委重大项目论证，而且起到了“老娘舅”的作用（注：在上海，人们常把那些有威望、讲公道的长者称作“老娘舅”）。比如，过去中央和市委精神一出，很多研究机构都抢着做同一个题目，力量分散，资源和精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浪费。决策咨询委成立以后对这类情况统筹考虑，按照市委意见科学分配任务，解决了这一问题。

当时的决策咨询委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对国产大飞机的落户、崇明生态岛建设、松江家庭农场经验总结、“营改增”的实施，都提出了很好的决策咨询意见。2007年5月，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继续深入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系列专题的情况报告》，习书记在上面批示：“市政协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系列专题的调研计划很好，选题准，安排周密，我都赞成……待调研成果出来以后，我将安排时间参加研讨。”2007年6月，决策咨询委根据习书记以及市委对推进下一阶段全市重点工作的有关要求，在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初步选定了四个调研课题，组织开展调研。第一个课题就是深入推动长三角联动发展工作调研，重点研究五年来上海与长三角联动发展中取得哪些新推进、新成效，深入分析影响、制约长三角共同发展与一体化推进的瓶颈。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非常关注。这方面他当时都牵头推动了哪些工作？

王战：确实，习书记到上海工作之前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问题的关注是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他看问题不是站在一时一地，而是着眼长远，从大局考虑。

2007年5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提出要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谋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好更大发展。这次座谈会之后，国务院于2008年9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5月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发展进入新阶段。

那次座谈会之后不久，2007年7月3日，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给我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他于5月中旬赴美国旧金山与湾区委员会负责人会面，商讨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与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在4月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内各项具体工作和落实情况。他了解到习书记一直在积极推动长三角经济合作，深感上海发挥经济中心城市作用、与周边省市产业分工、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时机到了，建议借美国旧金山湾区大型代表团访问长三角地区之际，举办“长江三角洲发展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加强国际间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与机遇。

收到这封信，我感到此事对推进长三角合作有一定的意义，就向习书记汇报了相关情况，但对于市委能否同意召开这样的研讨会也不确定。没想到习书记当天就作出批示：“可与有关领导探讨开会的方式与时间。”此后他还约见了罗康瑞先生。这说明，习书记是全力支持研讨会召开的。后来，湾区代表团来沪走访产生实质效果，就在那一年，上海成功引进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银行，设在杨浦区。也正因为杨浦区这一项目的落户，其他项目也纷至沓来，联合国的南南技术合作交易所后来也落户于此。推动了“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的转型发展。

2007年7月22日至26日，习书记亲自带队到江苏、浙江学习考察，进一步密切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领上海干部从江浙两地找差距，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2007年8月，习书记读到一份内参资料，名为《香港深圳两地研讨共建国际顶级大都会》，对于构建港深都会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这同样是一个跨区域合作发展的典型案例，习书记对这份长达17页、万余字的材料看得很认真，感兴趣的地方都用笔作了标记，最后还作了批示，指出港深都会是创新探索，但在制度、法律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障碍，希望上海能够借鉴其有益经验，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应进行创新探索”。我理解，习书记是希

望我们从中思考，长三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应该切实发挥龙头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采访组：可以想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有一些现实困难吧？对此习近平同志又是如何看待和解决的？

王战：长三角一体化是跨行政区的合作，推动起来确实存在困难。各地区往往都要先考虑自己的GDP、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就业，所以上海曾经一度只提“四个中心”，回避“龙头”的提法。但习书记来了以后态度非常鲜明，以上海城市精神的重新阐述为基础，谈到上海作为一个拥有“开明”“大气”精神基因的大都市，必须发挥好龙头作用。

习书记2007年带队到浙江考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上海要重点做好‘深化、放大、提升、搭台’工作，在加强合作、互动共进中实现共赢。要推动沪浙合作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努力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要放大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效应，推动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提高合作交流层次和水平，在党委、政府层面，努力提升相互沟通协调的水平；在企业、民间层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共同提升区域整体市场化水平。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搭建各种平台，着力增强金融、期货、产权、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服务功能；要抓住2010年上海世博会机遇，与浙江及其他兄弟省区市一道，更好地放大世博会效应，共享世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我认为，习书记这段话讲清了上海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要实施的举措，既高屋建瓴，又很有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

邢邦志：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习书记曾经强调上海和周边省市要有合理分工，他还总结了“三个在上海、三个在外面”，就是“头”在上海，“身体”在外面；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外面；关键制造在上海，产业链在外面。这个讲得很生动，也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深入。

王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上海考察工作，再次强调要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他指出，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要使命。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围绕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加强专题合作，拓展合作内容，加强区域规划衔接和前瞻性研究，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迎来了全面协同、融合发展新阶段。区域合作主题和平台不断丰富，已经形成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共有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人社、金融、涉外服务、产业、城市和食品安全等12个合作专题，并根据合作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和深化。都市圈建设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产业协同协作能力持续增强，以产业园区共建为载体，长三角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浙江嘉兴有1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与上海重点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后，江苏镇江主动对接，为大飞机提供航空座椅、舷梯等配件。目前镇江已成立航空航天产业园，成功引进近30个涉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可以说，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当之无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圈。

采访组：您刚才讲到，您作为市委决策咨询委主任，承担了为市委组织重大课题研究的责任。除了长三角一体化化合作问题，当时习近平同志还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王战：习书记关注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上海产业发展的方针。上海从“八五”到“十一五”，连续四个五年计划对于产业发展提的都是“三二一”，体现了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起初在“八五”时期，我们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上海当时在计划经济调节下，除了工业和商业别无其他，上世纪80年代初服务业比重还不到20%。后来逐渐的，很多人把服务业经济理解为发展服务业，注意力也就放在怎么把现代服务业搞上去。上海关于“四个中心”的提法，除“经济中心”外，另外三个实际上对应的都是现代服务业。

在筹备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前期座谈中，习书记讲道，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制造业怎么能丢了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促进上海产业发展方面的调研，先后到上海制造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农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等进行专题调研。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习书记确定了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方针。过去“三二一”的提法是有侧重的，首先是发展第三产业，然后是第二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则是把二三产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废。

我觉得，习书记对于“融合发展”的提法非常具有前瞻性。那时候，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运而生。但是我们在统计上面，把这一块计入到制造业里。比如说宝钢集团的产值都算作工业产值，但其实宝钢下面有很多是做软件、工业设计等业务的，实际上都是服务业。习书记在那个时候及时调整上海

的产业方针，紧紧抓住了融合发展的先进理念，对于上海整个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客观地讲，上海是老牌的工业大市，在发展重化工阶段是全世界做得最漂亮的；上世纪80年代，纺织业也是上海的一大骄傲。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的制造业却出现下滑现象。我曾经分析上海制造业的三个现象：一是外资企业“强而不为”，引进的外资企业虽然强大，但是不会把核心技术交出来，只是做表面文章；二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创新推动步履维艰，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国企拿出一一年盈利的百分之五十转化为研发经费，那报表上就只有一半的利润了，再加上高管都是任命制，缺乏一定的责任激励，前人搞创新，效益却成了后人“乘凉”，自然积极性不高；三是民营企业“活而不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活力强，创新动力足，但上海的民企和浙江比起来体量小了点。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上海既有重振制造业的责任，也有创造新辉煌的空间。习书记对上海产业发展方针的调整，无疑是及时的，也是根本性的，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后，新华社一篇报道讲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瓶颈制约，习书记读到以后，在上面作了很长一段批示：“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深入进行研究。可设立课题，展开战略研究；把课题交给有关研究单位，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讨论；最后形成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政策措施方案。请王战同志考虑牵头实施。”后面还讲得很具体：“我可参加专家研讨会，研究成果可提交市委讨论审议。”

根据习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对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了专项研究安排，总体要求是牢牢把握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超前研究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度性政策性设计和准备方案以及相关举措。每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我们都以决策咨询委员会专报的形式及时向习书记以及市委报送，习书记对每一期专报都看得非常认真，时常作出批示或批转要求。2007年10月27日，我们还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组织召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家研讨会。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了，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对于上海来讲，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破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第三个“办”，也就是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吧。

王战：好的，这也是习书记指导上海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时间不长，但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多次指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要充分认识抓好上海党的建设的特殊重要性。上海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不辱使命。

我清楚记得，2007年8月28日，习书记在调研卢湾区后告诫大家，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卢湾区是中共一大会议所在地，从精神象征的意义来讲，卢湾也应该成为党建的先进所在地，这样才能不辱门楣。他专门提到了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说卢湾区地处繁华之地，领导干部在这里都要经受各种考验，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以更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习书记就是这样把上海的党建工作放在党的重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认识的，也是放在党的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加以推进的。

实际上，习书记一到上海，就要求尽快安排党建调研。市委组织部建议去上汽集团调研国企党建，去静安区调研社区党建包括商务楼宇和“两新”组织党建，习书记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认为体现了上海的特点，很快就在2007年4月17日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习书记深入街道社区、“两新”组织一线，同基层党建工作者深入交流。也正是借这次调研，习书记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座城市，如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上海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他希望基层的党组织共同来实践并破题。

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习书记对加强党建用了很大的篇幅，较之前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从一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努力形成团结奋进干事业的良好局面。

2008年8月2日，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但他仍然在一份资料上对上海党建工作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

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他把党建的三块都写得很清楚，不是很笼统的批示，足见他对上海的党建工作念兹在兹。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显著特点？

王战：习书记对上海工作的谋划，他不是做短期打算、搞过渡，而是立足上海长远发展。就像我刚才讲的，习书记的布局是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后进行大规模的调研，然后就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展开部署。“四个中心”是中央对上海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他就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始破题；抓区域协调，就从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入手；市里的经济工作，他重点关注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有条不紊，谋定而动。

习书记谋划工作具有极强的长远眼光和国际眼光。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建设。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市正着手筹建“上海中心”大厦，要将其建设成为陆家嘴核心地段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市规划局联合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公司等几家国资公司共同开展方案征集、建设评估等工作。2007年8月18日，习书记到“上海中心”项目组考察，在浦东新区国家开发银行大厦仔细观看了方案模型。习书记对这项工作极为看重，提出了很多大厦设计的总体定位和建筑原则。习书记认为中央把上海定位为“金融中心”，上海应该有一座金融城，而这座金融城的点睛之笔在于“上海中心”。他说，点睛之笔就要浓墨重彩，建设上要有国际眼光，建成后可以拿出来和国际上任何一座超高层建筑媲美。习书记还在现场敲定了“上海中心”建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结构高度建为580米，要保证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上海最高的楼。2008年11月29日，“上海中心”大厦进行主楼桩基开工。2016年3月12日，建筑总体正式全部完工。2016年4月27日，宣布试运营启动。2017年4月26日，位于大厦第119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正式向公众开放。由此，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正式揭开面纱，屹立于世界公众面前。

当时，“上海中心”总体设计方案也是习书记亲自“拍板”选定并提出设计原则的。他说，“上海中心”在建筑形态上要挺拔、稳重、大气、简洁，还要体现环保、节约的生态理念和超前的科技理念。他提出，搞这种建筑，安全决定一切，首先从建筑的安全性出发，同时兼顾工程的可靠性、结构的合理性、面积的实用性，成本上要可控。在建筑形象上，造型、寓意要体现标志性，要让人眼前一亮，不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更不能有负面寓意；在群体形象上，要和周边建筑浑然一体，体现和谐之美。他还特别强调，方案细化设计过程要阳光化，充分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要注意与群众对话。我们听到这些话都非常受触动，习书记并不是建筑专业出身，但对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有很独到的见解和眼光，特别是提出的设计原则和理念既有前瞻性，又强调切合实际，确实令我们叹服。如今，“上海中心”大厦已成为上海一张亮眼名片，被誉为立体的金融城，还先后获得“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上海科技创新特等奖”等荣誉，其标志性、安全性、创新性、实用性、独特性都得到了世界好评好评。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时，还特别来到“上海中心”大厦。他在119层观光大厅俯瞰这座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大都市，还认真询问了当年他关注关心的那些民生项目的情况。

总体来说，我认为主政上海的工作经历对于习书记而言有三层意义。第一，从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习书记经历了地方不同层级重要领导岗位的历练，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干部工作经验的积累。第二，他为上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带领上海干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被动局面，重振信心和士气，短短7个月时间调研了所有区县以及很多重要领域和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对于稳定局面、进一步深化上海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上海“排头兵、先行者”地位更加名副其实。第三，他由此从地方走向中央，为领导全国层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举措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抓的工作，有很多都可以在上海找到端倪。

邢邦志：讲到习书记在工作中的特点，我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感受。首先，习书记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他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上海未来发展要坚持“四个放在”：一是要放在中央对上海的定位中；二是放在全球化大趋势下，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有全球视野；三是放在全国的大格局中；四是放在中央对长三角的定位上。以往，上海人考虑上海问题大部分想自己的事比较多一点，但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出了上海本该有的胸怀与格局，讲出了海纳百川、纵横捭阖的大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他是一个开明睿智的人。我刚才讲了他提出的“三不”观点，在上海期间，他还提过“三个区别开来”。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周，习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全会，针对陈良宇案件给干部群众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专门指出，要把市委集体作出的正确决策跟个人的错误区别开来，要把个人的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和

执行错误决定的行为区别开来，要把工作中的态度和个人的观点区别开来。这“三个区别开来”提出以后，我觉得对上海的干部触动很大，许多人也由此一改畏手畏脚的工作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

第三，习书记是一个淡定从容的人。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闭幕后，习书记在上海兴国宾馆就世博会筹备工作接受了九家媒体联合采访。采访前，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十几页的素材稿，有很多数据，涉及很多内容，但最后，他没拿稿子，现场侃侃而谈，挥洒自如。

第四，习书记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还记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间歇，几位领导都在主席台上，我鼓足勇气，拿着10个信封走到习书记面前，说：“我代表报告起草组请您给我们签个名。”他当时就笑着对我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就在台上给我签了10个，让我转发给大家。一般的领导，可能让秘书带回去再签，但他不是，体现了满满的诚意。

王战：习书记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保持一种炽热的人民情怀。当时习书记知道我们开展重点课题研究，民生问题是很重要的一块。2006年底至2007年初，《瞭望东方周刊》对全国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城市总体幸福感调查，上海三项指标居于全国首位，也有几项在全国相对靠后。2007年8月，市政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习书记报送了《由上海幸福感指数全国排序引发的思考》，他在上面作出批示：“应关注‘幸福感’，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但不必过度关注绝对指标。”

习书记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我记得有一次，习书记在从杨浦区调研回来的路上，看到沿途一大片高楼，沉吟片刻，说：“上海高楼林立，这么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加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不能让老百姓受灾。”他还说，前一天晚上听到外面没有一点声音，就睡不着了。“这么大的城市我还没管理过，这声音一响，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不放心。”他这一番话给我很大触动。正是因为习书记对老百姓怀有极高的责任感，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老百姓，才会寝食难安。

以往，大家对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印象就是前呼后拥，到基层调研有时就是走走形式，根本不深入。可习书记大不一样，他到基层调研都要提前做好功课，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和老百姓聊天也都是聊他们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从来不搞大排场，每次调研都是轻车简从，他也从来不给基层提特殊要求。平时和我们交流工作，他也很喜欢听我们讲意见建议，让我们畅所欲言，从来没有架子。

习书记非常注重党的红色传统传承。有一次，我听到他感慨地说，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革命根据地或纪念馆，陕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有闽西苏区，浙江有南湖，上海有中共一大会议址，还有二大、四大召开地。他还说，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懈动力。我理解，也正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考虑，党的十九大一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望来时路，坚定前行路。

习书记还非常尊重老同志。2007年7月，习书记带队到江浙调研的时候，有一天住在杭州刘庄，晚上10点多钟，他忽然叫我过去，我当时以为有重大的事情。结果习书记对我说，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稿子叫我特地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其中对于王力平（上海市政协原主席）和周克（上海市委组织部原部长）两位老同志，让我亲自上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习书记也专门邀请老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修改，可见他对老同志的尊重绝不是表面做做样子，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采访组：这些年来，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交往也比较多，请您从日常接触的角度谈谈您的感受。

王战：我为习书记直接服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认为这是信任，也是缘分。

2007年3月，习书记到上海任职不久，有一天他问我：“2005年是不是你陪我到洋山港去参加活动的？”我说是。2005年，总投资130亿的上海洋山国际深水港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港。实际上洋山这块地是浙江的，因此开港仪式也邀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我奉命去枫泾接他。我想，这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陪他坐面包车，总要聊点什么。后来想起，他在农村插过队，又在正定当过县委书记，那我就跟他谈谈农村吧。习书记上车以后，我们就从农村改革聊起。我说，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古而有之，均田制就是封建社会的家庭承包制。习书记听了，感觉我的观点很新鲜，来了兴趣，让我接着说下去。我说，中国和欧洲的一大区别就是，中国北魏开始搞均田制，欧洲搞的是长子继承制。按照均田制原则，15岁的男丁分地60亩，地多人少，种不过来，一方面催生了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中国农村“多子多福”的习俗，认为多生儿子，有了强劳动力，就能耕作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收益。一代代下来，中国的国情就变成了人多地少。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是现象，根源是均田制崩坏，黄河频频泛滥，老百姓在中原地区活不下去，就出现了唐宋两次大移民。而欧洲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就到城市自力更生，或者参加十字军东征，或者到海外参与扩张。之后，文艺复兴、新教革命、思想启蒙运动直至工业革命，都可理解为“次子们”讨生活的所思所为。（下转5版）